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文化版图重构与 宋金文学生成研究

沈文雪/著

The Study on Reconstituting of
Realm of Culture and Formation of
Song and Jin Dynasties Literature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文化版图重构与 宋金文学生成研究

The Study on Reconstituting of
Realm of Culture and Formation of
Song and Jin Dynasties Literature

沈文雪/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版图重构与宋金文学生成研究/沈文雪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 9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 - 7 - 5112 - 0372 - 4

I. 文… II. 沈… III. ①文学史—研究—中国—宋代
②文学史—研究—中国—金代 IV. I2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7863 号

文化版图重构与宋金文学生成研究

作 者: 沈文雪 著

出 版 人: 朱 庆

封面设计: 陈 瑜

责任编辑: 祝 菲

责任校对: 徐为正 叶乾华 张祎娜

特约编辑: 曲冠杰

责任印制: 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 - 67078251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 - 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本: 690 × 975 毫米 1/16

字数: 245 千字

印张: 13.5

版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112 - 0372 - 4

定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 录

导 论 / 1

上编 文化版图重构与宋金文学命运的再造

第一章 文化版图重构的发生背景 / 6

第一节 北宋与金海上盟约的缔结与关系的恶化 / 7

第二节 北宋末期与金一致推崇元祐的文化根源 / 11

第二章 宋金相持：政策取向意义与文人文化的关系 / 13

第一节 南宋初始对内政策的确立与中原文化南移转机的起点 / 14

一、“是元祐非熙丰”与对金时势及文人心理的关系 / 14

二、政策的导向与文人、文化的转型 / 20

三、“尊王攘夷”与理学兴盛缘起之关系 / 28

第二节 金源初始对内政策的确立与中原文化兴建北移的过程 / 36

一、统治者特定心理与中原文化引进及其汉化的关系 / 37

二、楚材晋用的具体举措 / 40

三、重北轻南政策与中原文化北移 / 43

四、苏学北行与文化变革出新之发展 / 46

第三章 宋金对峙局势下文士分野与文学命运的再造 / 53

第一节 南渡与北渡：文士空间分野 / 53



一、南渡文士的被动选择 / 55

二、北渡文士的无奈出路 / 57

第二节 战和与仕守：文士政治分野 / 62

一、南渡文士主战与主和分野 / 62

二、北渡文士守节与出仕分野 / 67

中编 党禁与文祸：宋金时政与文学生态

第四章 绍兴和议前后南北政治气候与文士的遭际 / 80

第一节 高压政治下南宋文士的命运 / 80

一、相权政治与党禁 / 81

二、畏祸心理与内敛人格之归 / 87

第二节 异族统治下金源文士的命运 / 92

一、金源和战之争与党禁 / 92

二、皇统党狱与君子小人之辨 / 101

第五章 隆兴和议后南北政局与文士的关系 / 106

第一节 中兴文士交游与党祸遭际 / 106

一、学派纷起与交游唱和 / 107

二、庆元党禁与党韩之祸 / 113

第二节 金朝尚文之风与党争之祸 / 119

一、宗儒尚文与国朝文派的崛起 / 119

二、皇权政治与党争之祸 / 122

第六章 嘉定和议之后南北文祸与文士的心理 / 128

第一节 舆论钳制与江湖诗祸 / 128

一、宋对金关系及其文士的江湖化 / 129

二、史弥远擅政与江湖诗祸 / 133

第二节 好吏恶儒与党锢之祸 / 139

一、金对宋关系及其文士的布衣化 / 139

二、高琪当政与党锢之祸 / 144



下编 宋金文学的历程及地域风格差异

第七章 宋金文学的历程 / 151

第一节 文学再造期：宋金文学气韵有别 / 151

一、沉重的身世之感与家国之痛 / 152

二、梦绕神州与有志不骋的悲愤 / 155

三、归隐与内心矛盾的两极趋向 / 156

第二节 文学发展期：宋金文学各具特色 / 160

一、盛世忧歌与颂歌 / 160

二、济世与幽独心态 / 163

三、山水雅趣与田园牧歌 / 165

第三节 文学转向期：宋金文学兴衰起伏 / 169

一、怨愤不平与乐天知命 / 170

二、行谒江湖之悲与游学论道之乐 / 171

三、羁旅行役之苦与战乱流离之慨 / 173

第八章 宋金文学的风格 / 178

第一节 文学风格的南北差异 / 178

第二节 地理环境对文学风格的影响 / 181

一、南北地理环境与风俗习惯 / 181

二、地理环境与文学中心及人才分布 / 184

余论：元好问南北集大成的文学史意义及影响 / 187

第一节 南北文学集大成地位及文学思想渊源 / 187

一、怪奇派与正统派文学上的论争 / 188

二、元好问文学思想的师承与创新 / 190

第二节 元好问在金元之交文坛的领袖作用及其影响 / 194

一、元好问与河汾诸老 / 194

二、元好问与元初文坛 / 196

主要参考征引书目 / 199

后 记 / 206



导 论

宋室南渡后，宋金对峙的局面长达百余年之久，宋金虽属两个对立的政权，但在文化上属于一个共同体。作为文化的一个层面，文学也体现出了南北一体化的进程。但由于正统观的影响，金代文学一度被排除于宋金文学史之外。上个世纪 80 年代之后，金代文学虽被纳入正常研究轨道，且在九十年代以后形成研究巅峰，但金代文学依然没有受到应有的“客观”对待。我们在各类版本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著述中，可以看到，金代文学要么是与南宋文学错位，要么是以少量篇幅出现于南宋文学之后。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与对南宋文学与金代文学根植的文化生态尚缺乏深入了解有关。

南宋与金朝作为辽、北宋灭亡后，同时期分裂出来的两个民族政权，它们南北对峙，不仅打破了此前的格局，而且还面临着如何重组或兴建的问题。由于这一层面的牵引，使得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都处于变革当中，因而具有了再造的意义，而文学的再造便囊括于文化的再造过程中。不过，与南北政治始终处于分裂状态不同，南北文化的再造有一个重构的过程，它的发展最终使南北共处于同一文化版图中，形成了一个共同体。但由于受某些固有观念的左右，人们在宋金南北文化一体性的认识上还存在误区。

在谈到中原文化时，常常提到它在中原动乱年代的南移，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等形成了中原文化三次由北向南的迁移，而对于靖康之难所造成的中原文化的北移往往不提。中原文化在南移的同时是否也北移了？这和政权及经济变迁等许多层面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往往会令人想到金所处的战争“侵略”地位，因此很少想到在文化上的影响，这本身是对史实理解的偏差。宋金由海上之盟的签定，到关系的恶化，直至北宋的覆亡，这一最终结果的导致，都有金人南侵的重要因素在内，但主要还在于北宋的政治腐败。这可从辽



降臣左企弓的献呈君王诗：“君王未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①所揭示的阻止金主与宋盟好的深层原因中窥视出。所谓“取宋责其背约，名为伐罪吊民”，^②亦不无道理。孙傅就曾言：“本朝祖宗德泽在民未泯，及国主新立，为大臣所误，以致违盟失信。”^③当时在辽降臣辅佐下的金人，对中原文化充满了向往，其对贤人后代的保护，对书籍的索要等等，已显示出了一定的文化见识，但由于戎马倥偬，“未遑礼乐之事”。^④故从文化的“兴建”、“兴复”运转的周期性角度来讲，中原文化的北移，与中原文化的南移是同时进行的，并且对于双方而言，人口分布的地理改观，成为文化版图重构的原始基点。

与高宗南渡，“民从之者如市”^⑤的情况不同。金朝，最初建于我国东北，在其向南拓展的过程中，实行的是内徙外迁政策，即大批的猛安谋客徙往内地，而大批的中原汉人流向东北。这一方面既有弹压人民反抗之意；另一方面也具有了对落后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发的意向。特别是对人才利用的用意，使得文化具有了“被迫”北上的性质，由《三朝北盟会编》“金人求索诸色人”及扣留宋使等资料即可见其一斑。汉人北向，金人统治汉人的重心也北移到金人对宋作战的后方即河北、山西。同时为了协调中原文明与金朝落后文化的差距，金初踵辽行南北面制度：即统治汉人的政治中心与金统治全国的都城所在地是不一致的。但随着改行汉官制，南北面制的废除，海陵王的南迁，金朝统治全国的中心便放在了中都（今北京），这样环北京一带的山西、河北等地便成为中原文化北移之后的发展中心。

中原文化的南移，是汉人政权的南移造成的，是因政权的再建而引发。文人的生存空间与地理分布的组建，主要是与局势、环境影响密切相关，在靠近与金对峙的淮河流域地区，人口密度极低；相反远离战乱区的四川和江南等地，社会相对安定，出现了爆炸性的人口增长。而就南迁者心境而言，“获安居”成了首要的因素，但因此也促成了当地文化生态的进一步改观。以岭南而论，就有“渡江以来，北客避地留家者众，俗化一变，今衣冠礼度并同中州”之语。^⑥宋金局势趋于稳定之后，大多南渡者基于仕宦考虑，又回迁都城

① 《左企弓传》，《金史》卷七十五。

② 《辩亡》，《归潜志》卷第十二。

③ 《附录四》，《东都事略》卷一百二十六。

④ 《太宗本纪》，《金史》卷三。

⑤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二。

⑥ 《舆地纪胜》卷一百四。



临安一带，因此形成了以临安为中心的文化发展重心带。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北方一般往往是指黄河中下游流域，而南方一般往往是指淮河、秦岭以南直到岭南的广大地区。与南方相比，我国的北方长久以来一直处于核心与主体的地位；期间，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也有彼此消长的阶段，但尽管如此，并没有改变北方文化的主体位置。宋金对峙时期，南北划淮为界，不但改变了这种状况，出现了两个文化中心，而且因北方地域疆界的极大扩展，中原文化的北上发展，易地生根，使传统的南北地域文化概念在此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最终使南北共处于同一文化版图中。当然，南北共处一体，文化奠定的基点有着很大的不同，《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曾言：“宋自南渡后，议论多而事功少，道学盛而文章衰，中原文献实并入金。”所谓“程学盛南，苏学行北”就是由此而发。南北文化发展的这两种不同趋向，也恰恰构成了辽、北宋文学分流后南北发展的标志性特征。

正因为对这一时期中原文化的南北迁移问题认识不足，或者说存有误区，从而存在对辽、北宋灭亡后文化版图重构下南北一体概念理解上的模糊，而这也影响了对南宋文学与金代文学的一体性认识，这是目前南北文学研究错位，甚至被割离的主要原因。

文化版图重构使南北共处于一体，宋金关系始终是连系的主线。因此，我们将这一时期的文学生成过程大体定位于宋金关系的三个发展阶段上：即借才异代时期（1123年～1164年）；和平相处时期（1165年～1205年）；关系冷落时期（1206年～1234年）。

“借才异代”，在南北表现的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南宋继北宋之后而建，文人也“易代”到南宋，这种“迁转”关系，不应以量而定，性质上的差别已决定了“借才易代”的性质，这是就南宋而言。而就金朝而论，借才异代的内在涵蕴就不能仅仅视为简单的政权跨越。

金朝的收国时间是在1115年，如果从时间上算起的话，自此直至延续到1164年（金大定四年，宋隆兴二年），都是借才异代时期，这期间和北宋对峙11年，和南宋相持108年，金太祖收国时，已是在辽文人的辅佐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就曾载有阿骨打“用辽秘书郎杨璞计，即皇帝位”事。那么文学上的主流传承是否由辽人开始？我们首先从诗歌方面来考察，据元好问《中州集》所录诗歌看，辽文人中，只录用了王枢、虞仲文两人的诗，且各自有一首；而北宋过渡到金的文人，有20人，其中仕者15人，不仕者5人，而且作品数量颇丰。以仕者而论，宇文虚中有50首，蔡松年59首，高士谈30



首，吴激 25 首，马定国 31 首，张斛 18 首，祝简 12 首等等；不仕者，姚孝锡 32 首，朱弁 39 首等，基本上涵盖了金初整个诗坛。退一步论，如果说《中州集》还有录用不全的嫌疑，那么，还可以在当时有影响的仕金辽文人中加以考察，以韩昉为例，《金史·文艺传》虽称其“善属文，最长于诏册，作《太祖睿德神功碑》，当世称之”，但却未见其诗传世。又如在征伐聘问过程中，比较有名的金使张通古，《建炎杂记》乙集卷十三虽言其：“性聪慧，秦桧以胡邦衡封事示之，一览即能诵”，但也只能以“稍能诗”誉之。金诗播衍的源头，只属北宋。而金之有词也是在灭掉北宋以后的事，至于散文等方面的传承影响也主要在北宋这一边。因为由辽入金的名家除上面提到的韩昉、张通古外，就是王枢、任熊祥、虞仲文、左企弓了。且他们基本上是在天辅六年（1122 年）十二月，金军破燕之后归降于金朝的。而虞仲文、左企弓又在入金的第二年故去。可见，文学传承的任务主要是由宋人来承担的。

基于此，我们将 1123 年（宋宣和五年，金天会元年）前后，作为文学流播分野的开端，把“借才异代”（指文学上）的时间界定为 1123 年到 1164 年。1165 年（宋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以后，宋金关系趋于稳定，与前此相比，创作群体特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新生代”作家的振起、“借才异代”局面的结束。1206 年（宋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以后，南北国势并衰，宋金关系已演变成宋金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金朝内部而论，文人政策已发生倾斜，从“好儒恶吏”已转为“好吏恶儒”，文人心态骤转；而南宋此时专制统治窒息、沉闷，文人激情被挤压殆尽，文学格局日渐狭小。与之相反，金代文学渐转向对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关注上来，境界呈开阔局面。

南北文人所处环境的阶段性特点，固然是文人风貌的取决因素，并因此构成南北文人的整体特征，但这仅是作为外部特征的表现，其内在有别，又和文人与政治的疏密程度相关。

这个时期，政体背景下的党禁与文祸是联系宋金内外两方面生态互动的直接体现，并因着“战和交织”的变化，而呈更迭的态势。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文学生态的考察，既有横向参照意义，又有历时文风转向的关照性质。初始对峙期，党禁与文祸的引发点是“主战与主和”，金朝主要是于上层统治者中的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进行，并进而影响到各派所扶植的文人身上；在南宋，体现为文人与统治者的矛盾，文人内部因倒向不同也发生了分化。金朝的朋党之争、党祸对文人的冲击虽然与南宋相比，没有其规模大，但从仕金文人内心角度而言，其心绪层面的波及度要深于南宋。隆兴和议后的金朝“党与”与



南宋“庆元党禁”，虽是源于宋金和平相处层面上的两起“党事”，但与初期党祸也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就金朝而论，其政策的重外轻内所引发的皇权之争一直是个最现实的问题，前引的主战、主和之争所形成的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分野某种程度上就是基于此，文人于其中难免不受拘束，或有失分寸。南宋的“庆元党禁”是统治阶级内部主战、主和的论争发展演变到恶劣的权力倾轧结果的体现。但“庆元党禁”对朱熹所倡导的道学之说的打击，也不无积极意义。南北后期的文祸虽表现层面有异，但成为南北文风转向的标志。

宋金关系三个发展阶段文人所处的内外环境特点，体现于文学上，它们只是构成了南北不同风格的一个方面，南北风格的另一方面便是自然环境与民族风俗等的影响差异。以往论及金代文学或南宋文学，之所以把它们看成是北宋文学的余绪，自然环境的被忽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自然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在风格特质上体现出较为鲜明的特色，便是北方的阳刚之美与南方的阴柔之美。作为文化的生成土壤，宋金时期，自然环境对文学产生的影响也作用于地域的民风、民俗，进而影响到文学的风格，而这些无一例外地都构成了南北地域的不同景观。

以上，从视野转换，改变日前文学结构的角度出发，还原历史，对宋金文学研究进行定位，一方面是本着对宋金文学的生成及其不同内质的探究，另一方面也是对这一时期文化版图重构与文学南北发展的一体关系的全局把握。这种关系当中既渗透着时代的、社会的因素；也有着地域的、民族的因素。作为这个时期的文学研究，无论是从整体着眼还是从个体着眼，它们都是不可缺少的考虑方面。由于以前的孤立研究，文学环境的割裂，而观顾不到或考虑不周，从而影响文学的评价。因此，将宋金文学放置于十二世纪初文化版图重构这个前提下进行研究，不仅会消除因南北文学分治所引发的文学研究上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将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国文学至元朝发生转折性变化与此期文学发展的关联意义。



上 编

文化版图重构与宋金文学命运的再造

12世纪初,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三个民族政权,即辽、女真和北宋。当时的辽处于天祚帝统治时期,“纲纪废弛,人情怨怒”,^①已濒临灭亡之势;当时的金,是一种新兴势力,已摆脱了辽的控制,于收国元年(1115年)建立了金政权;当时的北宋,处于徽宗腐败统治时期,女真势力的强大,使其萌发了联金灭辽、收复燕云等地的心理,北宋与金关系的缔结就是处于这种情况下。辽灭亡后,金又随后灭亡了北宋,在苟延残喘中建立起来的高宗政权随即南渡,是为南宋。这样一北一南,就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政权,本编对文化版图重构及文学命运再造的考察就肇始于此。

第一章

文化版图重构的发生背景

北宋与金关系的缔结,始于“海上之盟”的签订,^②这是北宋联金灭辽复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一“正月二十四日丙申”条。

^② 按:宋金“海上之盟”成立于宣和二年(1120年)。盟约内容,据《大金国志》卷一:“夹攻辽国,使金取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宋取燕京(今北京),帝许之岁币,初许三十万,而卒许与契丹旧数。”此外“约以本国兵(金人)自平地松林(今内蒙古东部克什克腾旗一带)趋古北口(今北京市密云县东北部长城要口之一),南朝(北宋)兵自白沟(今河北新城县东自北而南的白沟河)夹攻。”又据《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将来本朝(金朝)取了燕京,却要系官钱物。”双方约定,此后金朝不得与契丹单独讲和等等。



燕的一种盟约。当时辽国已乱，女真攻辽夺其地大半。在这种情况下，北宋“乞举兵以应”，^① 收复故地，不失为一种策略。但在夹攻辽过程中，屡见失信，从而招致靖康之祸、最后被灭亡的结局。金与北宋末期，推崇好恶的相同，可视为南宋、金源文化发轫的前历史背景。由这一背景切入，进一步审视南北互异的国势及与之相应的政治措施的指向，是考察文化版图重构内涵的基点。

第一节 北宋与金海上盟约的缔结与关系的恶化

金源在辽的东北，盖古肃慎之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载“其国在汉称伊抡，南北之间称和奇，隋唐称默尔赫，至五代始称女真。祖宗时，尝通中国，后臣属于辽。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辽海滨王耶律禧立，号天祚皇帝。立15年，女真完颜旻起兵。”关于女真起兵的确切时间，据《金史》卷二记载，当政和四年秋（1114年），故北宋与金签署的“约夹攻辽复取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之约即“海上之盟”的缔结当在此之后。而实际上北宋复取燕云之“心”，在政和初年，即已有之。据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童贯“得志于西羌，遂谓辽亦可图，因请使辽以觐之”。而结果是童贯至辽后便受到了其君臣“南朝人才如此”的嘲笑，^② 受辱之后的心情可想而知。适逢此时，“燕人马植得罪于其国，间道邀贯，说以取燕之策”，^③ 遂造平燕之谋。但因北宋统治者内部意见的不一，故出兵未遂。“约夹攻辽复取燕云”之策真正付诸于实施是在高药师归来后的政和七年（1117年），当时辽的形势是：“女真军马与辽人争战累年，争夺地土已过辽河之西，今海岸以北自蓟复至兴、沉、同、咸等州，悉属女真矣。”^④ 辽势浸微，这是海上之盟签订的历史背景。

因童贯等人唱言兴师北伐联金取燕，毫不顾及国势现有的状况，故遣使之初，与金商议约夹便受到了文臣士大夫的反对，如“（郑居中）谓京（蔡京）曰：‘公为大臣、国之元老，不能守两国盟约，辄造事端，诚非妙算。’京曰：‘上厌岁币五十万，故尔。’居中曰：‘公独不思汉世和戎用兵之费乎？使百万

① 《徽宗皇帝》，《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八十一。

② 《天祚皇帝上》，《契丹国志》卷十。

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建炎元年春正月”条。

④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政和七年秋七月四日庚寅”条。



生灵肝脑涂地，公实为之。’”^① 郑居中的反对与谴责也侧面的暴露了国家军储乏备的现实。早在政和五年（1115年），广安军进士安尧臣在一份上书中就言及于此且切中要害，其言曰：“宦寺专命，倡为大谋，燕云之役兴，则边衅遂开；宦寺之权重，则皇纲不振。……臣恐异时唇亡齿寒，边境有可乘之衅。”^② 这种担忧最直接的引发点便是国家承平、人不识兵革的现实。对此，置身于局外的“高丽”也洞察的非常清楚，据《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八：“初，高丽来求医，上遣二医往。是秋还，以其事及语录奏闻，然后知实非求医。乃彼知中国将与女真图契丹，因是劝止中国谓：‘苟存契丹，犹可为国家捍边。女真强敌，不可交也，宜早为之备。’”在内外交言，天下皆知不可的情况下，皇上态度摇摆不定。海上盟约签订后的不久，当得知“大辽已知金人海上往返”之事，又“深悔前举，意欲罢结约”。^③ 故在和金朝打交道的过程中，北宋屡出漏洞，其军政的无能及侥幸取利之心也日益显露：

（宣和四年九月）甲戌，良嗣将行，以国书副本及事目示马扩。扩大惊曰：“金人方以不报师期，恐王师下燕，守关不得岁币。所以遣使通议，一则欲嗣音继好，二则视我国去就，犹未知杨可世、种师道白沟之衄，宣抚司气沮而退也。在我固当守前约，且云：‘缘贵朝不报师期，疑海道难测，所以不俟的音，即举兵相应。’今仍趣宣抚司进兵，克期下燕。如此，则既于夹攻元约无爽，又绝日后轻侮之患。奈何自布露心腹，倾身倚之，大事去矣！”良嗣愕然曰：“宣抚司尽力不能取，若不以金币藉女真取之，何以得燕？”扩曰：“既知力不能取，胡不明白尽与大金，退修边备，保吾旧疆！安得贪目前小利，不虞后患，爱掌失指耶！”^④

北宋速欲求成，结果是再举攻燕不下，只好求助于金人。为此阿骨打曾言与马扩：“我初闻南军到卢沟有入燕者，我心亦喜，将敛军归国，却闻刘延庆一夜烧焚而遁，何至此耶？一二日到关，汝观我家用兵，有走者否？”^⑤ 根据海上盟约的规定，“金人取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宋朝取燕京

① 《郑居中传》，《宋史》卷三百五十一。

② 《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二“宣和元年春正月”条。

③ 《三朝北盟会编》卷五“五月十三日丙午”条。

④ 《资治通鉴后编》卷一百一“宣和四年九月甲戌”条。

⑤ 《女真》，《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七。



(今北京)”，“若出国（金国）所取，即不在分割”。^① 在北宋没能按照海上盟约完成夹攻的情况下，阿骨打最终仍然坚持将燕京交与宋朝，又特许了原来并没有许宋的土地，说明金朝是守信用的。至于金人向宋朝索要的燕京地租钱也当合乎情理，并非“渝盟”的表现。但最后为何发展到反目为仇，直至导致金军南侵呢？

对于这一段历史的评价，人们言论不一。有鉴于当时文人士大夫对“海上之盟”所持有的反对态度，故有人把它直接归之于宣和“海上之盟”的签订，把赵良嗣看成是“开门揖盗”之人（首建“约夹攻辽复取燕云”之策），如建炎三年（1129年），监察御史胡舜陟奏：“伏见今日构成边患，几倾社稷，实自归朝官赵良嗣。”^② 对此清人赵翼颇不以为然，其在《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四中辩解到：“使无收纳张觉之事，金人亦难遽起兵端，而中华疆土复归版图，良嗣方且当入‘功臣传’中。乃张觉之叛金来降，主国计者贪近利而昧远计，辄轻为招纳。良嗣方苦口争之，以为失欢强邻，后不可悔。而举朝醉梦，卒不听从。果致金兵得以借口，不惟新得之地尽失之，并至釜舆北狩，神州陆沉。”赵翼的分析不无正确，但促使金人兴师南向的原因，并不仅止于此，试读天会二年（1124年）正月八日金人的《回札子》：

赵宋前者航海遣使，请复幽燕旧疆。当此之时，分白约誓，同力收取，迺来竟无接应行迹。一旦天兵倏至，不血一刃，举土向风。盖自契丹二百余年，远近无敢回顾。爰念从初结好，姑务欢和，即时割与，恩义非轻。著定誓书：“若纳逃人，社稷倾危，子孙不绍。”曾未踰月，弃德背惠：手诏逆贼张觉，害我四执政大臣；邀我百官，更易姓名，公然任使。岁交金币，并不如期。及正旦使贺允中御前奏达，“传语”二字，特越旧例，深涉轻易。其于本国，穷奢极侈，上下相蒙；阁竖擅权，作为奇巧，克聚民间财玩，至有家室悬罄，人曷聊生？往往弊端，万莫言一。我皇帝审是数端，亡盟失道。上符天心，爰赫斯怒；大举天兵，数路并进，理当问罪。^③

靖康之祸的发生就是作用于上述诸种原因的背景下，而于当中，辽汉文人的加入对灭亡北宋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从某种程度而论，宋人假手于金来灭

① 《与宋主书》，《大金吊伐录》卷一。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四“靖康元年三月二十七日癸巳”条。

③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九“靖康元年正月八日甲戌”条。



辽，辽人反其道而行之，亦假手于金来灭宋，虽不无“报朝廷（北宋）助兵攻辽之隙”这方面的原因，^①但很大程度上是归罪于宋朝的腐败统治，特别是表现在对燕云地区的汉文人政策上。宣和五年（1123年），宋进驻于燕京，对待辽官实行“换授”法。“宋法，新附官不厘务”，^②使得很多文人生活上得不到保证，《金史》卷一百五就载有任熊祥向杨哲企求一事：“既不与事，请止给半俸以养亲”，但遭到拒绝。不给俸禄，只授虚衔，某种程度上就是玩弄儒生，“换官者，初自燕山之朝廷，又自朝廷之燕山，复自燕山之太原宣抚司，困苦于道路者相继也。官司人吏又沮格之，累年不能结绝。此曹怨望，往往遁归平州”。^③这是其一；其二，在争夺燕地过程中，许多仕宦文人之家南归于宋，“州郡又往往不恤，或困于衣食。其在阙下者，至于揭榜通衢人物往来处，称其姓氏旧官封而以乞丐，执政虽睹之不问也。”^④杜充知沧州，“虑为敌内应，杀之无噍类”；^⑤其三，将燕京的土地、田宅分赐给原辽降宋的郭药师，而迁走燕地职官户口，使被驱失业人，皆归怨于朝廷；其四，杀张觉函其首以与宗望，使归宋之士，人人自危，又纷纷转归金朝。“药师以契丹降将，被宋朝宠遇，锡赀之厚不可殚言”，^⑥但最终据“燕山”而叛，与此不无相关，《大金国志》卷七谓之“南北反复人”。

如果说金源初始，在同宋朝签订盟约时，还不够了解宋朝情况的话，那么在交往过程中，宋朝的弊端就逐渐显露出来。两次攻燕不下，金人始知中国兵弱。尽管如此，金人对宋朝的戒意还是颇深的，比如金人在攻下燕京后，宣和五年癸卯（1123年）春正月，金使来，赵良嗣报使，乞割平滦等州，与金人议租税定数等。事后“金人以议未合，断桥梁、焚次舍”，^⑦“亦恐我不从而自防也”。^⑧但至交割燕京之后，宋朝的家底就全部暴露出来了，诸如以上情况种种，足以说明问题。正因为这个原因，一些文人在宋人得燕后，屡招不出，据《金史》卷七十八：“太祖以燕、蓟与宋，新城入于宋。宋累召立爱，立爱见宋政日坏，不肯起，戒其宗族不得求仕。”又据《金史》卷八十三：张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四引《金虏节要》。

② 《任熊祥传》，《金史》卷一百五。

③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四“宣和七年十二月十日丁未”条。

④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宣和五年四月十九日壬寅”条；

⑤ 《杜充传》，《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⑥ 《太宗文烈皇帝五》，《大金国志》卷七。

⑦ 《徽宗本纪四》，《宋史》卷二十二。

⑧ 《资治通鉴后编》卷一百一“宣和五年二月丙戌”条。



通古“辽天庆二年（1112年）进士第……太祖定燕京，割以与宋。宋人欲收人望，召通古。通古辞谢，隐居易州太宁山下。”

回归于金的辽汉人，先是“具言中国虚实”，^①后又急力怂恿攻宋。天会三年（1125年），金娄室追擒辽天祚帝于应州新城东六十里，辽朝灭亡，辽政权转至金源手中；继而金以吊伐命名，对北宋发动了战争。徽宗内禅，金人“大惊，欲引去”。^②后郭药师言：“我在南朝二三年，备见其事。朝臣皆是书生，自分党羽，相为好胜，是者未必服，非是者背后窃笑而未必争，彼岂能有意家国？少帝（钦宗）复无英断，唯人言所惑，未必有人，不如姑行。”^③钦宗继位后，国势恶化，惯性驱使，实已覆水难收。北宋的腐败，直接促使其灭亡。《大金吊伐录校补·降封重昏侯诏》曰：“视颓纲以弗张，维何以举？循覆辙而靡改，载或尔输。惟乃父之不君，忘我朝之大造。向因传位，冀必改图；且无悔祸之心，翻稔欺天之恶。作为多罪，矜恃奸谋。背城下之大恩，不割三镇；构军前之二使，潜发尺书。自孽难逃，我伐再举。兵士奋威而南指，将臣激怒以前驱。壁垒俱摧，郡县继下。视井惟存乎茅经，渡河无假于苇航。岂不自知，徒婴城守。”天会五年（建炎元年，1127年）二月，金太宗诏废帝及上皇为庶人。四月，宋帝北迁，北宋灭亡。

第二节 北宋末期与金一致推崇元祐的文化根源

金与北宋由关系缔结的开始，到兴师南向，直至灭亡北宋，对北宋腐败政体有着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徽宗所任用的蔡京、童贯一系权倾朝野，背盟失道，误国害民的现实更是深恶痛绝。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1127年）2月，在金人下达《废国取降诏》之后的不久，便令推立异姓。面对军民耆老文臣等状乞立赵氏，金人不仅不应，而且予以的答复是：“若谓废旧立新，果难服从，缘赵氏太祖孰与推戴？自立尚可，何况遵依圣诏，择贤共立，孰谓不可！兼早有文字：‘唯贵道德，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④相反，对北宋朝廷监禁、打击的另一面——元祐党人，不仅十分推崇，而且加以“保护”与“尊重”，《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六载金人语曰：“使司马相公在朝，我亦不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二“宣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丙戌”条。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建炎元年春正月辛卯”条。

③ 《南迁录》卷十二。

④ 《元帅府札子》，《大金吊伐录》卷三。